

〔瑞典〕汤姆·R·伯恩斯 (Tom R.Burns)

等著 周长城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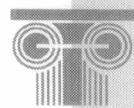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 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

*Structur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Human Agency,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瑞典〕汤姆·R.伯恩斯(Tom R. Burns) 等著 周长城等译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 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

*Structuring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Human Agency,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 / (瑞典)
伯恩斯 (Burns, T. R.) 等著；周长城等译。—2 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7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 - 7 - 5097 - 1553 - 6

I. ①经… II. ①伯… ②周… III. ①经济社会学 - 文集
IV. ①F069. 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1994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

——行动者、制度与环境

著 者 / [瑞典] 汤姆·R. 伯恩斯 (Tom R. Burns) 等
译 者 / 周长城 等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 任 部 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 子 信 箱 / bianyibu@ssap.cn

项 目 负 责 人 / 祝得彬

责 任 编 辑 / 高明秀 李 洋 王晓卿

责 任 校 对 / 王新明

责 任 印 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4.75 字 数 / 42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2 版 印次 / 201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553 - 6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教授
爱德华·弗里德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
刘 东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陆象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顾问，研究员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人文学院教授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黄 进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 20 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

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的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增订版前言

本书主要分析和理解形成制度和文化这些主要的结构是如何构建的，制度和文化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文化是如何演变的。

本书的第一编由三章组成。在这三章中介绍了我的理论的关键概念和社会理论基础以及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特别是 Walter Buckley, Margret Archer 和 Philip Gorski 等人的研究。

这一理论有三个核心的内容：社会系统理论分析（行动者—系统—动力学）、制度分析，特别是社会规则系统以及社会文化进化理论。

行动者—系统—动力学（Actor-System-Dynamics）集中讨论了社会行动者、制度和文化形成之间的相互逻辑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逻辑影响并不总是由它们的意图所决定的，社会行动者、制度与文化形成之间相互作用、重构并转换。

制度分析是一种制度与文化形成理论（定义为规则系统），制度分析显示出它们是如何构建的以及制度运行的方式，通过行动者的行为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使得制度适应于文化并推动文化的演进。制度分析是一种规则系统，它既通过解决问题的行动者的相互影响，同时也是通过社会结构和环境选择机制而进化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如下。

(1) 社会系统分析的基点是整体比部分的总和要大。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动态互动不仅构成了“出现的特征和机制”，而且还导致社会系统中不稳定性和意外发展。

(2) 这一理论从一开始，特别是和 Walter Buckley 的部分合作，行动者—结构问题就一直有一个中心概念，即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的缩写 ASD。行动者在已建立的社会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既有利于同时也会限制在无休止的辩论中形塑或重塑这些安排。

(3) ASD 研究始于多层次结构模型。自上而下的过程（例如，制度、

文化方面的状况及其影响力，以及环境状况）形塑并控制行动者及其互动。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和偏差性更改或抵消自上而下的结构。换言之，社会不同层次、不同环境中的多维度“结构”过程所形成的模式及其发展，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维的运行。

（4）在 ASD 的概念界定、分析和措施应用方面，制度及其他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和进化性特征起关键性作用。

（5）ASD 研究引发了对人们多种多样、普遍存在的行为过程的分析，如合作、生产、交换、冲突、权力的运用和控制，除此之外，还包括群体评议与决策。与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人们的态度、评价和行动及其社会构成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环境而定的——这是 ASD 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环境依赖不仅包含时间和空间因素，而且理所当然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社会形势等因素。

（6）人们有意识地构造了诸多社会现实：制度安排、社会技术系统以及更为常见的社会秩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复杂的建构可能与使其形成且/或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并不相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建构成为一个个行为方式不可预见、无从计划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①。换言之，虽然制定并实施这些社会建构的行动者大都拥有丰富的知识，但也仅能部分地理解它们。他们关于在现实社会中实施和调整制度的范式和模型非常重要，但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在一些灾难性事件中，譬如核电站或化学仪器毫无征兆的控制失灵，往往是某些未知的或未被注意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导致了不可预见的后果。

（7）ASD 鉴别并分析了多种因果力 (causal forces)（即不同类型的社會影响力）。这种多元因果关系分析方法由多种因果关系结构或生态组成，它对人的行动及发展的过程和结果都产生影响。有三种类型的因果力特别重要，它们共同组成了行动者、社会结构和环境的“铁三角”(iron triangle)。具体说来：

①行动者因果关系可以在过程层面（也就是说，在制度框架范围内）

① Frankenstein：中文译为弗兰肯斯坦，又译为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是英国著名作家玛丽·雪莱的同名科幻著作中的主人公，他是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的青年学者，经过无数实验，利用人类骨骼和动物器官造出了一个智慧生命——巨人。Frankenstein 因巨人面貌丑陋将其抛弃，巨人作为报复杀害了 Frankenstein 的许多亲人和朋友，最终 Frankenstein 心力交瘁死在复仇的路上，而巨人也因悔恨而自杀身亡。

发挥作用，比如某些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拥有权力的位置时可以影响其他人，或者在既定规范及其他限制条件下作出特定的集体决策。行动者也可以在结构层面开展行动，进而作用于制度结构、社会技术系统和社会安排，也就是说，元动力的演练。

②制度和文化形成（社会结构）也产生一种因果力，它们形成并规范社会行为和互动及其结果。但是，如上文中所强调的，ASD理论认识到在某些条件下行动者可能会抵消或转变制度安排，而在另外某种意义上又可能会抵消或转变制度和文化形成的因果力。

③环境/生态综合体是第三种类型的因果力。理所当然，这其中有些部分需要“外部”行动者的行动，以及在既定的社会系统中影响行动及发展的社会制度。这些是前面所提到的①和②两种因果力的特例。然而，更多的纯环境或“自然的”因果力在“选择”和“构造”（限制/促进）人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行动者对人类及其他物种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其影响力是巨大的。

(8) 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有助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它们是对制度、文化形成、社会技术系统、环境及其功能和动态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反映的一部分。我们的研究有助于辨别社会建构的实施中运转不良的事例，及其未预见到或非计划中的后果。社会反映也用来探索新的设计方案，及其可能存在的利与弊和长短期后果。

本书第二编从理论上解释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四个主要方面：①第四章研究了市场和在日益成形的市场系统、市场表现和动力中的行动者的作用；②第五章分析了货币（技术、制度和文化形式的货币资本）的多维度特征及货币所依赖的制度化信任和有效调节；③通货膨胀的危险是货币系统中最大的威胁，第六章揭示了通货膨胀的社会驱动（social driver）及后果；④第七章分析了市场系统另外一个难以解决且颇具危险性的特征，即不平等交换和不均衡发展。这些成问题的特征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完全是市场系统的本性使然，需要加以相应的调控。总之，第二编展示了现代经济得以运作并有可能功能失灵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本编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调控的作用，特别是为了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满情绪而进行的更加公正的社会产品再分配（假定市场系统倾向于导致分配不均和社会紧张及冲突等问题）。我们在第十章中又回到这些议题上继续探讨。

本书第三编主要探寻社会秩序的特征，解释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以及社会秩序又是如何变迁和被破坏的。四个关键的要素将被考察与研究，分别如下。①制度安排与制度进化部分是通过人的行为和制度安排自身的运行而实施的（如第八章）。②第九章讨论企业家与社会变迁，本章说明人的行为在其互动和企业家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导致社会变迁，甚至无意识的变迁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且也导致不稳定性和无序。③第十章分析了在集体决策的情形下，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冲突和紧张的已经建立的过程与机制。这样的过程与机制常常伴随着“解决冲突”以及导致社会均衡和社会规范的形成。本章说明在一个现代动态社会的分化、复杂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和紧张的情形下，这些过程（due process）和机制在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④第十一章研究了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和Nina Witoszek的共同的出发点是，我们的社会——由各自特定的社会秩序组成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总是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目前已经获悉我们将对地球这颗行星所造成巨大破坏，而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巨大破坏是不可逆转的。于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便是实现同自然更加和谐与“和平”，同时建立更为完备的社会公正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这需要重新回到本书第二编的议题，即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本章论证了制度、文化、科学及教育方面全新的议程。未能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寻求到根本性的变革，就意味着现代人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仍将像自食其尾的巨蛇一样——明显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危境，而且有助于确立通过制度和文化的重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

总之，本书试图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说明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解释和处理当代社会问题、社会和文化以及经济与政治等问题的力量。

伯恩斯及其行动者—系统— 动力学理论（代译序）

社会学家汤姆·R. 伯恩斯（Tom R. Burns）1937年生于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1959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物理系，1962年获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69年获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伯恩斯曾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新罕布什尔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隆德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乔治·梅森等大学的教授和客座教授；现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瑞典高级社会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欧洲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20世纪60年代，伯恩斯还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就开始对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The Theory of Actor-System Dynamics）感兴趣。行动者—系统动力理论与稳定性和转化性一道将行为者与系统结合起来。在社会现象的描述中，这一理论强调能动主体的作用（即有知识的有创造性的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以及系统、制度、组织、社会关系的作用，行为主体（或称代理者）在被迫寻求特殊价值和利益的同时，采纳、改变和转化系统，如市场、商业、企业、行政单位、政府机构等的制度安排。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伯恩斯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以及方法论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形成了以伯恩斯为主的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乌普萨拉学派”，即规则—系统理论。该理论研究主要是使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的关键要素得以发展：（1）社会规则和规则组合理论作为新制度主义的基础，把这些理论用于分析市场、科层制、民主组织和网络（这些研究主要反映在80年代至今的出版物中）；（2）运用以规则为基础的互动理论和博弈论分析权利、冲突、交换和合作（7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反映了这些研究）；（3）基于规则的社会进化理论的研究（90年代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此）。伯恩斯运用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所进行的实证

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经济社会学：集中在现代公司、工作组织中的高层管理的战略决策研究；货币与银行业的研究；市场与市场过程理论的理性研究；70~90年代欧洲国家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的比较研究；资本主义的形态、运行与演变研究等。②技术与环境社会学：关于节省能源和能源供给以及生物和医疗技术的创新，新技术开发研究；环境与技术开发中的法律、伦理和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③政治社会学：政治制度演变的研究，如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管理和欧洲国家的当代民主研究等。伯恩斯的研究既有其浓厚的理论特征又有其实证的基础，始终把实证研究置于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下。

能动主体与结构一直是围绕着社会生活中参与的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特别是在个人的能动性在社会系统所展示的限定下多大程度上能独立行动这一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以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和赫尔伯特·布拉姆（Herbert Blumer）为主的互动主义者认为“社会系统”的存在依赖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种观点认为能动主体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结构仅仅是其互动的结果；与此相反，以门菲瑞德·库恩（Manfred Kuhn）为主的互动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生活是被组织的，如果没有社会系统，行动者不能决定思考什么、感觉什么和干什么。换句话说，是游戏产生了行为模式而不是相反。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认为任何把社会系统和个人决然分开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两者分开后都不存在。无论是强调“社会系统”或“结构”重要的微观模型还是强调以能动性为主的宏观模型都不令人满意。吉登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尝试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互联性。伯恩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规则系统理论这一新的社会理论，“在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市场、科层制和社会技术系统等一些主要制度的新观点。社会规则理论倡导一种行动者结构动力学（Agency-Structure Dynamics）。伯恩斯把自己的社会系统理论根植于韦伯后经吉登斯和戈夫曼（Goffman）等人发展的丰富的学术传统之中，为认识能动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社会系统理论发展了其特征的一面，尤其是对结构和制度演变的确定的概念化。伯恩斯试图使他的系统理论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制度和组织分析方面，因此他采用了大量原始的个案研究实例，从劳动市场到能源预测。他试图对社会制度的形成、维持和转化的另一面作出明确的解释。伯

恩斯用系统规则、系统理论对现代社会中市场的结构及其运行、行政、信息、技术垄断、结构性的吻合和冲突的诱因等进行了独特的分析。

伯恩斯指出，人类活动，无论政治活动，经济生产与交换，还是艺术或者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都由社会性的规则和规则体系所组织和控制。根据社会规则系统理论，人类行为者（个人、群体、组织、社区、集合体）都认为是社会规则系统的缔造者和传递者。规则体系理论假定不同的社会行为常常倡导构建和管理社会生活的相互矛盾的而且声称是合法的规则系统。简言之，社会规则系统存在着冲突与斗争。组织管理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行为的主导规则系统决定认可的行为和特征模式，如语言、规范与法律、行动准则、家庭与社会制度、社区经济组织和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社会规则系统理论的中心概念是规则、规则系统、规则系统的构建、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和执行规则的社会过程，社会规则和规则系统的维持、修订和转化。规则系统理论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主要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和发展，这些定义包括“社会规则”、“社会组织和制度”、“相互矛盾与冲突”、“合法规则和规则系统的认可与接受”、“社会权力”和“社会秩序”等。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社会规则系统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变异。

由一些前后相互关联的和特定时限的规则组成的规则系统（rule systems）用于构建和管理社会交易，用于完成一定的活动和执行特殊的任务，用于在社会规范容许的前提下与其他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规则系统是有权威的，它由社会奖惩与权力和控制网络共同支持，因而在人们的认知方面具有客观的外在特质，规则政体类似于规范的制度；在个人的层面，规则系统转变为行动者用于在活动的限定情形和阶段与其他行为者交易中进行构建和管理的“社会行为的有生产力的规定”。

在伯恩斯看来，这一复杂且多维度的规则网络不能像迪尔凯姆那样将其视为给定的，而是社会行动的产物。“社会规则系统是人类的构建”，“能动主体不断地形成和改进社会规则系统”。这种形成与改进有三种方法：创造规则、解释规则和运用规则。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较大的自由边界，而且边界是不确定的；这些活动还是社会冲突和斗争的领地，也是一门规则形成的特殊“政治学”。规则系统诞生于人类活动，同时又过多地作用于人类行为。伯恩斯大量的当代社会中的实证研究支持并验证他的规则系统理论。

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而言，一提到进化理论就想起斯宾塞、帕森斯、哈贝马斯等一些宏观理论家，对进化进行生物进化论、功能主义、目的论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按照伯恩斯的观点，早期进化论学说定义为发展理论更为恰当。发展理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关键的制度、过程或者因素上。设想一种进步：从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如传统或原始社会）到一个共同的终点（如成熟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这种分析强调文化或社会组织中的变迁，对变迁的描绘是目的论的，不考虑一般的微观现象和个别的因素。能动主体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局限于加速或延缓，制度、文化和其他宏观社会力量是注意的中心，无论是孔德、斯宾塞、帕森斯，还是马克思、迪尔凯姆、哈贝马斯都有这种倾向。伯恩斯的理论吸收了生物学中进化的逻辑和种群的思想，但并不像达尔文那样作生物决定主义的演绎推论。他认为进化意味着变异的产生，规则的传承和改造，选择和其他有关规则体系的过程，宏观结构和总的现象是由微观过程形成然后又成为微观过程的选择环境。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是研究的出发点，特别是社会规则体系理论。将人类行为者的规则解释和规则的运用作为理论基础，伯恩斯用社会规则体系理论解释了文化的变迁与进化，他认为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由该群体成员所拥有的一套规则构成，每一规则出现的频率由知道和使用它的人群的数量决定。文化变迁是一种规则在人群中的频率分布的变化。文化差异是人群中规则频率的不同所致，文化差异的程序取决于亚群体和主群体之间规则频率的差异。这样，伯恩斯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文化选择的新进化主义理论。

在伯恩斯的研究框架中，制度有一套规则定义，即交往的情景；参与交往的个体和群体；行为恰当的规则，包括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中的角色。伯恩斯认为社会规则的产生、选择、传递和再生过程是各种规则盛行和持续的重要动力，因而明显地影响文化和制度秩序。进化的力量对人群的差异发生作用，选择过程和传递肯定某些规则并导致它们逐渐地流行。伯恩斯把选择过程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杰出人物如掌权者、革新者和领袖人物对规则的有意识的主动选择或称 P 选择；建立在共享社会规则人数和特定社会结构排列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选择或称 S 选择；以及基于物质环境对人类行动的反应的 M 选择（详细解释参见本书正文）。遵守传递（“照别人说的做”或“照别人做的做”）是获得规则的有效途径。

伯恩斯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诸如社会系统动力学与进化制度主

义；互动主义和社会博弈论；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学；制度与组织；认知社会学与人的意识；权力研究、权力动态学与民主；技术、环境与自然资源等。伯恩斯教授学术成果颇多，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 29 本著作，发表了 60 多篇论文，并有 100 多篇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伯恩斯的大量研究与合作具有跨学科性和国际性，他的研究已超出了社会学领域，与他合作的除社会学家外，还有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等；合作者分布在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埃塞俄比亚、德国、荷兰、意大利、马耳他、挪威、波兰、斯洛文尼亚、瑞典和美国等地。

周长城
1998 年 1 月
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中文第一版前言

20世纪70年代系统论的最大成就是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Actor System-Dynamics)(以下简称ASD)，它将社会关系、群体、组织和社区看做一系列各自具有独特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彼此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既定边界的杜会系统，并且系统整体上是开放的，与外部环境保持着频繁互动。通过与外部互动和内部运动，杜会系统不断获得新的要素并发生改变，由此导致某种连续的变革。

根据系统论至少是社会科学系统论观点，ASD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创新：①将个人看做富有创造力（同时亦具有破坏力），能够自我反省、自我转变的行动者；②文化与制度是人类行为的主要环境，但就行动者而言，对文化与制度必须通过社会规范和规范系统加以内化；③互动过程镶嵌于文化与制度结构中；④杜会系统既能反映出杜会紧张与杜会失范，也能反映杜会道德冲突、杜会群体利益冲突与斗争、杜会关系与制度安排的内在矛盾；⑤杜会规范系统的发展与变化受以下因素影响：通过互动发生的人类行为；由自然生态环境和产生并维系杜会制度的社会行动共同作用所形成的选择机制。

鉴于系统论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杜会学中备受批评，所以ASD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批评包括：系统理论缺乏自己的理论范式；无法对杜会生活中的冲突加以辨别并给出定义；长期以来一直忽略了杜会系统中某些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负面影响；无法确认人类行动，因为个人与集体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作出选择、自我反省、参与杜会构建甚至破坏现有系统。

不同学科（包括物理学、生物学、杜会学和经济学）存在相同的组织概念和原则作为某些系统论者的一项基本假设，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不仅是出于经验原因，更是出于道德原因。人类活动根本不同于粒子、原子、电子或者其他纯粹的物质运动，因为人类富于创造性并且遵循社